

《澳門記略》探微

劉月蓮*

《澳門記略》一書是清乾隆前期（18世紀中葉）第一任澳門同知印光任和接任的權澳門同知並晉第三任澳門同知張汝霖二人合作撰寫的。該書稿先由印光任在上任澳門同知的乾隆八年（1743）即姝手收集資料，經兩成初稿，請粵秀書院山長徐鴻泉審稿，卻因徐病卒而失落原稿本。乾隆十六年（1751）四月印光任署潮州知府，恰好張汝霖亦至潮郡署鹽運通判，公餘聚首，重尋殘楮剩墨，印光任“搜覓遺紙，零落輯集”，竟還能於“旬日間得其八九”，遂編成第二稿，由張汝霖“定其體例”、“大加增損”，這才使《澳門記



《澳門記略》所繪〈三巴寺僧圖〉
圖中儒服洋僧形象似為利瑪竇

略》失而復得。此書前後“牘削兩手而需成者七八年”⁽¹⁾，在乾隆十六年七、八月間得以完稿。張汝霖序稱《澳門記略》是他藉為“補過之書”，諒其中必有難言之情事。檢視是書“篇中尤三致意焉”

而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完成初稿、五十四年（1789）定稿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史部地理志存目”收有《澳門記略》條，稱係“安徽巡撫採進本”。⁽²⁾張汝霖卒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

用以“補過”者，蓋指張氏在《澳門記略》裡補收了乾隆十一年他的奏件〈請封唐人寺奏記〉和十二年廣東督撫〈嚴禁愚民私習天主教以安民夷以肅法紀示〉，以及十四年張汝霖與香山令暴煜共同擬訂的〈善後事宜條議〉等重申朝廷禁教旨令和治澳加強管理的法令文件，藉以申明作為澳門同知恪守職責的嚴正立場。

清末曾任澳門同知的陳坤於光緒十年（1884）在廣州重刊《澳門記略》，跋云：“聞有是書，訪諸坊間不獲，嗣得自江南，蓋公〔張汝霖〕歸里後所刊。”

* 劉月蓮，澳門文化研究會學者，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博士。2000年赴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流動站，此文為其研究課題之一。

因此，《澳門記略》初版刊行的年代似不可能在完稿的乾隆十六年當年，而可能在張汝霖卒於安徽老家的乾隆三十四年前後之若干年份。迄今僅見的“乾隆原刊本”可能就是北京圖書館收藏的那個“西阪草堂刻本”。

關於書名，或可望文生義地推想，“略”除了“概略”之義，亦可引申為“經略”、“方略”、“策略”、“韜略”諸義。“方略”確曾作為清代官修史書的一種特殊樣式，它是紀事本末體史書發展的新形式，多用於記載重大軍事事件的始末。清廷曾專設“方略館”作為臨時修史機構，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

敕撰《開國方略》至五十一年（1786）竣工。方略亦稱紀（記）略。據《清史稿·藝文志二》紀事本末類著錄，道光以前敕撰的方略、紀略十餘種，其中稱為紀略的有《臨清紀略》、《臺灣紀略》、《安南紀略》等，皆為反映康乾時期重大軍事活動的記錄。然而，《澳門記略》是印光任早在乾隆八年（1743）擢澳門同知時就做準備編撰的，雖以“記略”為書名，卻與朝廷專設的“方略館”毫無關係，其“奇偉”的內容和樣式實屬獨創，它對於澳門史領域而言，尤其具筭路藍縷之功。印光任談此書稿的寫作緣起說：“念事屬創始，爰歷海島、



民國間上海印行的《澳門紀略》封面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本

訪民番、蒐卷帙，就所見聞者記之，冀萬一補志乘之缺。而考之未備，辭之不文，必俟諸博雅君子。此《記略》之所由來也。”⁽³⁾張汝霖也認為《澳門記略》是“上不通郡乘，下不陵一邑之書”，“涉於澳者靡著之，否悉舍之”，故稱之為“略”，乃“昭其共也”，“章其實也”。⁽⁴⁾全書由上卷的〈形勢篇〉、〈官守篇〉和下卷的〈澳蕃篇〉組成，如此詳盡的澳門考察報告可說是史無前例，堪稱獨創。由於澳門被視為“化外之地”，不能以府志縣志擬之，然而

《澳門記略》“於山海之險要，防禦之得失，言之最悉”⁽⁵⁾，故向來被看作海防志要籍之一。

倘從“澳門學”的視角去看，《澳門記略》可說是中國最早出現的一部系統地介紹澳門開埠與發展的專門史要籍，也是一部生動地描述澳門自然地貌、人文景觀以及夷俗民情的地方志書，並稱得上是迄今所知的世界上最早刊行的一部澳門歷史文化專著。⁽⁶⁾它相當客觀地記錄了昔日“孤懸海表直接外洋”，原先祇不過是“南方一黑子”的香山巒蠻家漁村，而經“開市以還二百餘歲”，逐步發展成為明清中海外交的貿易重鎮和中西文化磨合會通的

獨特實驗場地的歷史風貌。明清朝廷和廣東地方政府自澳門開埠（1557）到設立澳門同知的二百餘歲間，對駐澳葡人採取“暎縻政策”，“大事修戎，小事修刑”，進行時鬆時緊的有效管治。而澳門之開港互市、為求“上下交濟”⁽⁷⁾使之成為自16世紀以降中國一個獨特的對外開放窗口，反映了明清江南及沿海區域“資本主義萌芽”所觸動引發的“傳統內變遷”的社會需求。《澳門記略》相當翔實而客觀地為我們提供了截止於18世紀中葉澳門歷史全景的真實面貌。

印、張二人絕非“徒尚空言，不適實用”⁽⁸⁾的迂腐儒生。二人先後在澳門同知任內處理複雜的中外交涉事務靈活果斷，敢於擔當，實事求是，有理有節。因而兩人先後於澳門同知卸任之時皆留下傳為佳話揚名青史的特寫鏡頭。印光任因“東莞稅事造冊遲延部議鑄級”，“就道日，各屬士民買舟送至數百里外，旗幟掩映，紅蕪江流”⁽⁹⁾，這是祇有為百姓做了大好事的清官才能得到的口碑。張汝霖在香山知縣任上就參與封“唐人廟”，夷人兵頭議以武抗，“霖手疏數百言，反覆論其是非，而利害之形亦具。計檄且至，霖單騎赴之。夷大感悟，環抱霖足而泣……”⁽¹⁰⁾，可見張汝霖的膽識與應變能力超卓之處。以當時的複雜環境而言，張氏如此果斷而靈活地處理涉外糾紛事件，還是相當得體的。姚鼐對張汝霖治澳之功褒曰：“君尤能得夷民情而柔調之。”至於近人有張汝霖落職係接受澳門議事會（Senado）賄賂一說⁽¹¹⁾，恐乃似是而非之一樁歷史懸案。姚鼐寫的張君墓誌銘說“時設同知官甫二年，上吏以君賢，俾攝其職”，“值事，吏議降一級，上官惜君去。”由此看來，處理兵頭若些庇匿罪犯一案有“讓步”之嫌，並非張子“獨斷妄為”之過，事與廣東主政當局者有關；而張子自覺以《澳門記略》作為“補過”之“龜鑑”，反而益顯其儒雅恢宏風度。暴煜《香山縣志》載張汝霖“去任之日，士民謳思不置”云云，暴煜是與張汝霖合作的當事人，可證張氏實有恩於澳門民眾，並非諛辭。

印光任，江南寶山人，雍正四年（1726）由保舉孝廉奉旨發廣東，歷任高州石城、廣寧、高要、

東莞知縣，所至有政績，捕盜去害，人文蔚興。乾隆八年他在東莞知縣任上處理英艦仇劫呂宋船事件，救出299個西班牙俘虜，外交斡旋出色，駕御夷敵有方，擢陞肇慶府同知。乾隆九至十一年（1744-1746）被選派為首任澳門同知。乾隆十年值英法戰爭之時，英夷六船於十字門外追劫來華貿易的法國商船，印公親駕戰艦出海，聲色俱厲地叱責英商，令英商噤聲遁去，一時海面肅然。任公治澳，居恆撫馭澳夷，開誠布公，示以恩信，民夷洽和。當其草創之始，從容擘畫，尤加意人材、義學、課藝，士人德之。甫上任澳門同知即挾手調研準備撰寫《澳門記略》，親歷澳門海島、訪問當地華人和夷人，蒐集各種文史檔案資料，“就所見聞記之，冀萬一補志乘之缺”。他確是一員罕見的既可“抵精兵十萬”又具實學經世之才的儒將。

張汝霖（1709-1769），江南宣城人，乾隆元年（1736）由拔貢保舉發廣東，任河源、香山、陽春知縣。曾署徐聞、英德、澄海知縣和南澳同知。張汝霖為官廉介公慎，以釐奸剔弊為己任。知香山，獎勵開墾沙田，興修羅婆陂水利，拓建豐山書院，有“善養善教，百餘年僅一見”之譽。他毅然拿出自己的官俸去重修張世傑墓，“而於表忠式墓之典，三致意焉”，流露了追思先烈正氣浩然的一腔愛國情懷。其於乾隆十一、十二年（1746-1747）任香山知縣權（兼署）澳門同知，於十二年二月巡視澳門，查封澳門唐人寺。十三年實授澳門同知，卻因處理澳葡兵頭若些（António José Telles de Menezes）庇匿殺死華人之葡兵罪犯事件而忙得“心力幾瘁”，卒因乘上司授意對澳葡當局作了若干讓步而被議削職。張氏去任之前，為了“尋已事之龜鑒”，復於乾隆十四年（1749）與香山知縣暴煜共同制訂〈澳夷善後事宜〉十二款勒石刊布，宣示廣東官府加強對澳門監管之力度。張汝霖“其至香山者再，而攝署之縣又三四焉”⁽¹²⁾，對稱為“香山南境”的澳門民俗夷情相當熟悉，甚得印光任賞識。印公坦言《澳門記略》之重補，“猶得腋集成編，此非張子不能成”。張汝霖實為一位擅於應變的治澳大員。他“性嗜學，凡兵刑、錢穀、律曆諸書靡

◀ 光緒十年（1884）廣州萃經堂刻本
封面（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原大）



不淹貫，故敷政張弛盡善”，
“尤工詩文……自成一家言，
海內名流翕然宗仰”⁽¹³⁾，由
他去補綴其時有“江州司馬”
之譽的印公佚稿，尤其是在巧
用夾註勾沉以詩證史之微言大
義的行文策略方面，極其豐富
地深化了《澳門記略》的隱義
和史識內涵。

俞正燮（1775-1840）十分
欣賞《澳門記略》，說：
“始讀《澳門記略》，愛其奇
偉。”⁽¹⁴⁾俞氏是清代一位學
問淵博淹貫經史百家的著名考
據家，被陳寅恪先生譽為“一
代儒林宗碩，湛思而通識之
人”（《寒柳堂集·俞曲園先
生病中囑語跋》）。他拈出
“奇偉”二字評騭《澳門記
略》的寫作風格特徵，相當準
確。在苟活於那個文網密織時
代而忍辱負重的士人精英分子
的視野裡，《澳門記略》的字
裡行間確實隱含一股朦朧地
令憤世嫉俗者眼睛為之一亮的
警世意味。

印、張合撰《澳門記略》
絕非附庸風雅之舉。此書雖僅
“兩帙”，然“事屬草創”。
它看去像一部原來要厚實得多
的《澳門記事》，卻因撰述者
諱莫如深幾經刪削所綴拾的殘
稿，因而顯得“體例不備”、
“群類弗該”了。張汝霖在序
言裡說明“云‘略’何也”的
緣由，筆底閃爍“篇中三致意
焉”的機鋒，語氣顯得詰屈詭
譎，欲言又止，用心良苦。他

梁披雲先生為〈新禧重修永福古社碑記〉書丹之電腦拓稿

【碑文內容：澳門沙梨頭永福古社，坊間傳說為宋端宗行宮或陵寢故址。蓋先朝遺民懷國憂思之所繫歟？惟觀昔巖石坊尚存香山何吾駒閣老題額「水月宮」，明季消息於是隱見。而洪武頒壇制於天下，里社百戶立壇一所，祭五土五穀之神，斯猶可考。逮夫清初海禁重開，聚落盡繁，本鄉居民遂集淺灣崖溪，實華夷屏界之前哨重地。康熙二十四年，粵海關澳門總口設於毗鄰鳳凰山之西側，而永福社壇儼然崛起，合乎職貢新圖登里版之制，猶存華夏封疆誓命委壇起壘之古風。惜夫前塵悠遠，舊址僅見民國十三年重修碑志。抑又何幸澳門回歸，特區政府成立，千禧獻歲，輒動工修葺廟壇，赫然發見垣壁隱藏嘉慶十年重修澳門永福古社碑記與乾隆五十四年新建永福古社亭碑。文物重光，聲明不顯，郁郁乎盛哉！豈止鄉社禮俗之可稽，誠亦足徵吾邦主權之尊崇，凜鏡同胞衷誠之感奮者焉。】

新禧 重修 永福 古社 碑記

澳門沙梨頭永福古社坊間傳說為宋端宗行宮或陵寢故址。蓋先朝遺民懷國憂思之所繫歟？惟觀昔巖石坊尚存香山何吾駒閣老題額「水月宮」，明季消息於是隱見。而洪武頒壇制於天下，里社百戶立壇一所，祭五土五穀之神，斯猶可考。逮夫清初海禁重開，聚落盡繁，本鄉居民遂集淺灣崖溪，實華夷屏界之前哨重地。康熙二十四年，粵海關澳門總口設於毗鄰鳳凰山之西側，而永福古社壇儼然崛起，合乎職貢新圖登里版之制，猶存華夏封疆誓命委壇起壘之古風。惜夫前塵悠遠，舊址僅見民國十三年重修碑志。抑又何幸澳門回歸，特區政府成立，千禧獻歲，輒動工修葺廟壇，赫然發見垣壁隱藏嘉慶十年重修澳門永福古社碑記與乾隆五十四年新建永福古社亭碑。文物重光，聲明不顯，郁郁乎盛哉！豈止鄉社禮俗之可稽，誠亦足徵吾邦主權之尊崇，凜鏡同胞衷誠之感奮者焉。

公元貳零零零年秋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立石

先指說澳門事務的繁瑣：“分守之職，率為冗閒，而澳擬專閫，隸四望縣。”“澳擬專閫”係治澳涉外的複雜政務，而“略”的撰述範圍，僅屬“涉於澳者”，因此說明“略”的功能在於，“昭其共也”“章其實也”。張汝霖在前序首段之後，筆鋒一轉，指出“濠鏡開市以還，二百餘歲間，大事修戎，小事修刑”，而“政莫大乎官制、田制，而數數云爾者”⁽¹⁵⁾，借用孟子“此其大略”之義自況，認為《澳門記略》“若踵事而潤色之，則惡能亡？”他囑意深遠地呼喚來者，“儼然長望於後之君子也”。印公對此懷有共識，對張汝霖的提法大加肯定：“是吾志也。”由此可見，《澳門記略》並非一般的地理方志或稗乘史略，其撰寫之動機蘊含藏之名山傳諸其人的史家隱義，懷有“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和抱負。澳門原來祇不過是“南交一黑子耳，一枝遠寄等於蒙鳩”的“化外之地”，《澳門記略》讓人窺見了在18世紀中國歷史巨大背景前的一座海市蜃樓似的東西方近代文明交結會通重鎮的清晰投影。

《澳門記略》開篇題目“形勢篇（潮信風候附）”，給讀者的印象似乎祇是一種地理志書。起首介紹濠鏡澳的地理形勢，提及明天啟元年始立前山寨參將府，康熙三年改為副將府，“未幾以左營都司代”，其後出現全書第一道蠅頭小楷夾註：

“何準道曰：康熙七年秋，海賊從寨右登岸攻劫果福圍村。副鎮遂請移駐縣城，坐令扼塞之地武備損威。”註畢續正文述至康熙五十六年於前山寨建土城炮臺規模，直至乾隆九年建廣州府海防同知署，亦即印光任履任澳門同知之前歷來管理澳門設置的變化情況。此全書第一道夾註的用意，顯然是肯定何準道對前山寨關防重要性的看法。何準道其人具有何種政治背景值得《澳門記略》的作者如此鄭重地轉引其抨擊地方官吏“武備損威”的論政高見呢？

何準道，字且兼，號菑園，香山人，明崇禎十五年（1642）舉人，官至吏科及事中（《勝朝粵東遺民錄》卷二按語指“此當唐王或桂王時官”）。清軍入粵，其父何吾騶督師三水，準道從義軍中，參與南明廣東地方政權之抗清戰鬥。明亡，遂遁跡不復出，與屈大均、高儼、謝長文、陳子升等酬

和。從屈大均贈何準道詩可略窺其中消息：“老矣黃門客，軍中昔苦年。江山無半壁，市井有孤臣。海日生紅樹，天風起白蘋。相公家學在，詞賦亦經綸。”⁽¹⁶⁾何準道乃崇禎朝閣老何吾騶大學士的長子。何吾騶（1582-1650）是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纂修《神廟實錄》，由庶吉士歷官少詹事，崇禎五年官至體仁閣大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六年十一月加尚書，同王應熊入閣。溫體仁久柄權，擬旨欲斥給事中許譽卿。文震孟爭之，吾騶助為言，遭訐奏罷官。唐王自立於福州即召為首輔，與鄭芝龍議事輒相抵牾。閩疆既失，踉蹌回廣州。永明王以原官召之，為給事中金堡、大理寺少卿趙昱等所攻，引疾辭去，卒於家。⁽¹⁷⁾一說何吾騶曾參與“擁立聿鏗”，亦官“紹武”朝，與蘇觀生、曾道唯等輔翼最力。⁽¹⁸⁾其實，1646年八月隆武帝在汀州遇害，何吾騶即函兩廣總督丁魁楚和原廣西巡撫瞿式耜，建議速立桂藩，而朱聿鏗在十一月初於廣州稱帝，何吾騶和隆武入閣的陳子壯、兵部侍郎張家玉等人皆持反對態度，而朱聿鏗尚來不及用上其年號的“紹武”政權即於十二月被清軍摧毀。⁽¹⁹⁾前引翁山贈詩就透露了何準道“從父軍中”參與抗清鬥爭的悲壯信息。入清，何準道“以遷海之禍，出居甘竹、靈洲間，多方外交”⁽²⁰⁾，參與聯絡海外抗清志士的活動。

澳門沙梨頭有土地廟稱永福古社，今猶存一座用何吾騶遺墨“水月宮”三個大字題額的石牌坊，落款署“明大學士何吾騶書”。傳說該址為宋端宗疑陵或行宮之一。道光新修香山縣志〈馬南寶傳〉載：景炎二年，端宗自潮之淺灣，航海避敵，過邑境。南寶獻粟千石餉軍，端宗召拜權工部侍郎。帝幸沙涌，暫宮於南寶家。元師陷廣州，募潮居里民出師，帝舟復駐淺灣。元兵來襲，張世傑等與戰於香山島，敗績，奉帝舟退保秀山，旋次碙州，帝崩。《大清一統志》有載：“馬南寶募端宗於縣南五十里，壽星塘仍稱疑陵。”《崖山志》端宗遺詔有“海桴浮避澳岸棲存”句。澳門沙梨頭土地廟前，清初原為淺水海灣。公元2000年春，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修葺永福古社廟壇，赫然發見垣壁隱藏嘉慶十年〈重修澳門永福古社碑〉與乾隆五十四年〈新建永



▲ 光緒十六年(1890)《嶺海異聞錄》所收《澳門紀錄》刻本封面(原大)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

福古社亭碑》，卒使澳門永福古社歷史之謎浮一大白。《澳門記略》完稿於乾隆十六年，全書看不到有關永福古社的相關記載，但在上卷的幾幅〈澳門記略圖〉中，可尋出記有“沙梨頭”字樣的地點：1）〈青洲山圖〉中青洲隔海之右上角標“沙梨頭”處係“三巴門”外的海邊丘凸地；2）〈正面澳門圖〉左上角在“大馬頭”和“花王廟”之間標有“沙梨頭”，字上方有一組平房在連接“三巴門”的圍牆之內，屋外長一棵巨樹，圍牆外是海水；3）〈側面澳門圖〉畫得較清楚，“沙梨頭”標在圍牆外大樹的外上方，海邊有明顯的小山丘，山丘和“三巴門”間是一些鱗狀農田，分別標上三個“田”字。當時澳門有名的中國寺廟如娘媽廟、新廟、觀音堂在各圖上都有清晰的圖示標記，而沙梨頭一帶卻完全沒有與“永福古社”有關的圖文標記。看來永福古社是在《澳門記略》成書之後若干年才建起來的，其中或與張汝霖治澳之年大興表忠社祭之風有關

係，或可望有新發現。

暴煜《香山縣志》說張汝霖知香山縣為民利經畫盡力，“善愛善教，百餘年僅一見也”，“而於表忠式墓之典，三致意焉。宋末張太傅越國公塋葬赤坎村，數百年來榛莽翳如，幾為狐兔穴。霖行部至止，捐貲代石封碑，華表煥然。仍設祀田，遣官春秋祭。”張汝霖為修張世傑墓事，在《澳門記略》開卷〈形勢篇〉裡利用蠅頭小字的夾註大肆渲染，整整用了佔〈形勢篇〉八分之一的篇幅痛快淋漓地轉載了他和羅天尺、郭植、李卓揆、何邵等人的追悼詩文。張汝霖親撰張世傑墓碑文，褒贊張世傑“孤忠大節，扶宇宙而植綱常”，“當是時，宋事已無可為，太傅屯井澳，駐啫門，眾二十萬，經七閱月。瀕海之邦，其君子贊策而宣獻，其小人執爰而饋餉，雖至於敗亡誅滅，而有所不悔。其公之精誠義烈，俾犯難而忘死歟？抑斯民忠義之性，激發而自响歟？都人士生忠義之鄉，千載而下，流風不泯。”竭力表彰抗元民族英雄張世傑和粵東沿海“忠義之鄉”民眾的愛國獻身精神。

從羅天尺的詩題“張司馬修復張太傅墓寄示碑文因感成歌”可知，張汝霖修張世傑烈士陵墓工程歷時經年，到他擢澳門海防同知之乾隆十一年（1746）後才竣工。羅天尺詩云：“……司馬重修越國墓，鬼雄執役國殤護。正氣增培赤坎村，忠魂不用天閻訴。表忠原是男兒心，天綱共挽無古今。”如此正氣干霄的文字，竟然出現在介紹澳門周邊地緣概況的字裡行間，恐非尋常閑事。羅天尺（1685-1766），順德人，鳳城五子之一，博學多識，為廣東督學惠士奇所賞，詩名大噪，乾隆元年（1736）中舉不再赴試，隱居石湖結南香詩社。⁽²¹⁾羅天尺與張汝霖交甚篤。張子曾於乾隆十四年（1749）冬與香山李卓揆冒雨訪石湖草堂，作〈二羅行〉長詩相贈，有句云：“安能君似羅山長作主，我侶浮山海中窩。萬里長風海上來，浮山忽與羅山遇。天俾李子作鐵橋，兩山終古吹不去。”⁽²²⁾次年春，天尺訪汝霖於廣州禺山寓齋，與粵秀書院山長郭植論詩。張汝霖評羅天尺詩云：“其詩之有成也，于以樹幟詩壇，接武三家〔指嶺南三大

家〕，誰曰不可？”李卓揆也是香山名士，康熙五十年舉人，後任知縣。他的〈和張司馬修張太傅墓成示張劉諸子詩〉有“正氣乾坤萃，丹心宇宙懸。艱難取義日，慷慨致身年”、“憫忠勞郡伯，裏事屬群賢”、“永福陵遙接，紹興墳播遷”等意味深長的詩句，反映了張汝霖修張世傑墓之凜然義舉甚孚眾望。郭植〈張太傅墓為柏園司馬新修因賦長歌奉寄〉對張汝霖更贊美不絕：“柏園司馬文章伯，神晤前良感魂魄。一來濠鏡政優優，尚向天山理往蹟。……梅花永福總淒然，父老誰為奠寒食？太傅心留一片丹，不葬波魚葬名巒。夜臺應率田橫輩，生前擁戴死盤桓。獨惜易名典祀乏，何時朱夢廂兩夾？飛陟峰頭擊鼓唱，大招神馬重騰顯金甲！”乾隆元年舉人、順德人何邵〈讀張司馬宋越公張世傑墓碑歌〉則云：“香山司馬才無比，懷古悲秋長劍倚。行部時時弔夕陽，辨疑縷縷從青史。……豈緣異代感興廢，直為千古扶綱常。”借張世傑的國殤亡魂發洩高壓之下的抗清民族情緒，在《澳門記略》的開篇幾形成仰天長嘯慷慨激烈的大合唱，令人難以置信！

在《澳門記略》開篇裡大載特載這麼多追懷張世傑的時賢隱士的唱和詩文，確實不同尋常。張世傑墓遺蹟並非在澳門，那就更加不同尋常了。是不是正因為張汝霖修張世傑墓這件事，引起了澳門沙梨頭華界居民追思先賢的愛國情懷而發起修築“永福古社”？或許還有何吾騶的族人鄉親一直在澳門積極參予祭祀先賢烈士的活動，遂使那“永福古社”透露的網緼正氣香火不絕地延續至今？澳門永福古社石牌坊留下了何吾騶手書“水月宮”，蓋隱寓“明寢”之意，其抗清復明的歷史寓意呼之欲出。《勝朝粵東遺民錄》序言提及何吾騶，對其評價甚為客觀公正，茲錄於下：

蓋明季吾粵風俗以殉死為榮，降附為愆。國亡之後，遂相率而不仕不試，以自全其大節，其相劇以忠義，亦有可稱者。何言之？自順治丙戌冬李成棟、佟養甲以偏師襲廣州，紹武遇害。踰年春，成棟復追桂王及於桂林，勢將殆矣。而粵之陳文忠、張文烈、陳忠愍三臣

序

澳門記畧一書印子傷之而屬張子哉乃事者也其云畧何也臆削兩子而需成者七八年今書凡三篇舉其一以麗其餘以言手體例則不備以言手筆類則亦該故曰畧也分守之職率為冗閒而澳僻專閩隸四望縣事云蹟已今涉於澳者履者之不悉舍之上不偏即乘下不陵一邑之書然則畧者貽其共也且西蕃過矣九州之大馳行有言而亥步或未之歷其職方外紀諸書復囿於聽睹而力不能致君子曰惟其播也以畧之者外之於其所不知以畧之者聞之也聞嘗取大一統與圖而覽之意大里亞在西海之極與陸處之俄羅斯直澳門南交一黑子耳一枝遠寄等於蒙嶺顧自濠鏡開市以還一百餘歲間大事修戎小事修刑而余與印子值紅毛痞即西呂宋之轉轄兵頭若此之懷盪念子手之括握尋已事之龜鑑篇中尤三致意焉抑亦將藉為吾補過之書而已客有難之者曰古人書以畧名惟漢劉子駿總萃籍為書謂之七畧今子之意將毋同張子曰教書曰畧選其名也余書曰畧章其實也何必同雖然有說焉子與氏曰嘗聞其畧又曰此其大畧政莫大乎官制田制而數數云爾者一以答諸侯一以望滕子是書成前手吾之君子書缺有間所不敢无若踴爭而潤色之則惡能亡懷然長望於後之君子也印子聞之曰是吾志也請并書之以為序

乾隆十六年歲在重光協洽之七夕宣城張汝霖書

澳門記畧

序

一

重雕澳門記畧題辭依用二宋全韻

兩公有才凌沈宋家守遺編盡珍重文瀾直與海潮爭安邊緯畧為國用形勢官守及澳番書紀民風婉雅頌披羅錄入四庫書海內詞人反覆誦當其搦管開軍門古里占城尊一統炎波能令大鵬飛怒濤得遂巨鱗縱啾啾退西洋來天遣文人解忿訟列傳江河終古同流傳藝圃書田自耕種馮也益測望洋驚小儒何足矜博綜願書萬本示後來重付雕鐫分鶴俸但恨生已廿年遲不及升堂笑語共東坡曾作海外文龍宮應蓮名花供今年我跨東海東只有圖書屢騎從長風萬頃堆琉璃月車碾浪照巖縫遥指南澳隔重雲茫茫但見凌波射伸眉開卷如卧遊懸續奇文達所製老屋燈為校書青如讀西京賦汗雍肯堂肯構子若孫芸香不被蛛網封蓬山債重鶴書求珥筆詞曹掃雲稊梧棧手澤什襲藏程門我愧才愚慙鄭箋郭注力未能偶設偏旁不覺恐暗窓高讀日取柔四庫全書以此種列之史部莫晒嗜痴為人癡 承德齋馮翼

澳門記畧

題辭

一

振臂一呼，義兵蠶起於時，破家沈族者踵相繼也。養甲懼，遂令成棟旋師。及三臣敗死，山海諸義士猶擁殘眾為復讎計，會城之外至於號令不行，李、佟因是有反覆為明之舉。蓋桂王所以延其殘祚者，實維吾粵諸臣之力。至若何吾駒、黃士俊、王應華、曾道唯、李覺斯、關捷先等，雖欠一死，後皆終老巖穴無履新朝者。故貳臣傳中，吾粵士大夫乃無一人。而吾駒、士俊，以崇禎朝舊相輔桂王。及平、靖二王圍廣州，桂王西走，吾駒獨率眾赴援，士俊亦坐閣不去，其苦心勤事，思保殘局，比之貳臣傳中馮銓、王鐸等，自當有間。⁽²³⁾

前引郭植詩尚有“嗚呼！祥興（南宋帝昺年號）去今五百年，啫門已事鎖風煙。潮居猶隕騷人淚，悲詞放作瓊瑤篇”；李卓揆詩則有“人聞徒有恨，地下久無權。太傅留封域，巋然慰九泉”；何邵詩也有“年年麥飯薦遺民”、“五百年來廢墜地”等慷慨悲烈之聲，令人感受到文天祥〈正氣歌〉的餘韻猶在《澳門記略》的字裡行間迴響，令後來者讀其書而有所覺醒浮想聯翩。

康熙盛世一片娛樂昇平景象，有道是“海內宴安，民生富庶”，表面上看來，官民各得其所，社會處於無為之中，士大夫間盛行“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程朱理學，“華者競辭章，賢者研考據”，或醉心於故舊，興整理考訂之風。然而，康熙晚期在思想文化領域已採用高壓與懷柔雙管政策，不斷製造文字獄，對士人加以種種思想禁錮，進行殘酷殺害，藉以消滅異端反叛思潮和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到乾隆時，對民族意識實行更為嚴厲的扼殺，務使見諸載籍文章的民族思想消聲匿跡，清初興起的實學高潮亦因之鍛羽而轉向低沉。即以乾隆開四庫館為例，計禁燬書籍達三千多種十五萬餘部，銷燬書版達八萬件以上，實為中國文化史上“史無前例”的空前浩劫。據說，自順治二年（1645）黃毓琪病死獄中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尹嘉銓被殺，竟有三分之二的文字獄冤案發生在四庫館開館之後⁽²⁴⁾，可見乾隆朝集權專制之黑暗酷

烈。18世紀中國士人處於文化專制主義的高壓下，文人賦詩命筆動輒得咎，遑論議政，而編史著述更被視為禁區。“今人之文，一涉筆惟恐觸礙於天下國家，……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鱗而以為蛇，遇鼠而以為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此於世道人心，實有關係。”⁽²⁵⁾文字獄令乾隆朝士人惶惶不可終日，人際“往往挾持睚眦之怨，假藉影響之詞，攻詰詩文，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牽連親故，破家亡命。”⁽²⁶⁾

《澳門記略》末篇介紹明季傳入中國的眼鏡，引李紱〈眼鏡詩〉。那個李紱來頭不小，是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歷官侍講學士、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直隸總督，乾隆時充《明史綱目》館副總裁和內閣大學士。他死後家中抄出詩文被指為“怨望譏訕”，累及子侄幾遭殺身之禍。乾隆二年已有一道聖旨指“凡發人詩中陰私無叛逆實跡者罪坐”⁽²⁷⁾。乾隆四年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的沈德潛輯《國朝詩別裁集》（乾隆二十五年），自序說“唯祈合乎溫柔敦厚之旨，不拘一格也”而“以牧齋、竹垞所選，備一代之掌故”，“唯取詩品之高也”，振振有辭自鳴得意。他竟昏憤到去求乾隆皇帝賜序。高宗一看大為光火，即厲聲疾色御製一序訓斥之：“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亂民也，有國德存。至身為明朝達官而甘心復事本朝者，雖一時權宜，草昧締構所不廢，要知其人則非人類也。”⁽²⁸⁾直斥沈德潛“老而毫荒”“無達大義”，怎麼把“名教罪人”也爭先入選了？“命內廷翰林重為校定刊行，……盡削謙益及清初諸老詩之有怨誹者”，隨即厲禁錢謙益、屈大均……諸人之詩，終以一柱樓詩案奪德潛贈諡。”⁽²⁹⁾沈德潛歿後，弘曆帝猶耿耿於懷，又傳諭江蘇巡撫楊魁勒令查察《國朝詩別裁集》初、續刻板片曾否銷燬；聽說廣東、江西均有翻刻本，“又命在廣東遍行搜查”，其事至四十二年始告寢。⁽³⁰⁾乾隆三十八年開館編《四庫全書》，翌年上諭亦旨在嚴查禁書：“明季未造，野史甚多，其間譏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³¹⁾其

澳門記略

二卷

嘉慶庚申重刊於江寧藩署

澳門記略一書印于海之內... 嘉慶庚申重刊於江寧藩署... 嘉慶庚申重刊於江寧藩署... 嘉慶庚申重刊於江寧藩署...

時將明末清初時人顧炎武、黃宗羲等著作均干禁例，對錢謙益、呂留良、屈大均（今種）、金堡（澹歸）之列查禁格外嚴厲，被乾隆銷燬的禁書“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³²⁾。

至此，我們發現了一個疑義待釋的難題，即《澳門記略》巧用夾註勾沉以詩證史的寫作策略收錄了為數不少當時被朝廷列為禁書作者的詩作。全書引詩計有釋今種（屈大均，番禺人，1630-1696）多達二十九首（包括〈澳門詩〉一題前後收錄共九首），陳恭尹（1631-1700，順德人）二首，梁佩蘭（1630-1705，南海人）二首，釋繩刪（1637-1722）五首，方殿元（1636-？繩刪從兄）一首，羅天尺（1685-1766，順德人）三首，郭植一首，李卓揆（康熙五十年舉人，順德人）一首，何邵（乾隆元年舉人，順德人）一首，羅寧默（與陳恭尹、梁佩蘭同時人，順德人）一首，梁迪（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新會人）一首，汪後來（1678-？康熙四十一年武舉，創汾江詩社，番禺人）三首，以上很多是同聲相求活躍於嶺南詩壇的知名詩家；作者印光任十首、張汝霖二十二首；另有明成祖一首，林麟煥十六首，黃瑜（黃佐的祖父）一首，文天祥一首，顧炎武一首，李珠光二首，王世禎十四首，尤侗二十二首，毛奇齡一首，李澄中一首，王軫一首，高詠二首，今日僧一首，陳王猷一首，王鴻緒一首，宋肇二首，高啟一首，吳偉業一首，李日華一首，李紱一首，佚名一首等。據初步統計，上卷夾註引詩三十八首、中卷二十五首、下卷九十二首，合計達一百五十五首之多。所引嶺南詩家不少為“嶺南詩派”名家，如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號稱“嶺南三大家”，何絳、方殿元為西園白蓮詩社名家。嶺南詩派的形成當追溯到宋季抗元民族危難之際。嶺南作為抗元燁爭的最後據點，湧現一批愛國詩人，開嶺南派悲壯抗風之源，歷明初“南園五子”及嘉靖間之“南園後五子”，聲勢大盛；萬曆年間粵詩力祛浮靡得嗣正音；崇禎間“南園十二子”中陳邦彥、鄭露、張家玉諸詩人投身抗清烈火，以血肉之軀譜寫愛國詩篇，令嶺南詩派浩然正氣貫注山河。到了清初順康年間，崛起“嶺南三大家”，氣

勢雄闊、沉鬱深雅，開創一代風氣，為海內外仁人義士推重。尤其是屈、陳二位詩人，在嶺南抗清燁爭失敗，即先後北上聯絡志士力圖恢復，與之結交大計者皆北方詩壇名宿，如顧炎武、傅山、錢謙益、李因篤等大家。梁佩蘭北遊亦獲一時朝野名士如陳維崧、宋肇、納蘭性德、高士奇、孔尚任等所重。號稱南北二詩宗的朱彝尊（竹垞）、王世禎（漁洋山人）亦先後入粵與三家交善，影響深遠。尤其是在明清之際，江南文士和嶺南文士常見聲氣相通互相仰慕甚至同仇敵愾共襄義舉者。

《澳門記略》的行文策略煞費苦心，單線行進的直述鋪敘往往被刻意安排的大量詩文夾註截斷，乍看似拉雜拼湊，時見借題發揮喧賓奪主之處，令人應接不暇。如開篇述及澳門以外海路分門，介紹虎寨門，即夾註引時人薛韞⁽³³⁾〈虎門記〉、釋今種〈望虎門諸山詩〉、方殿元〈登虎頭山詩〉之後，接上正文說：“又名秀山，宋張世傑奉帝昺退保秀山即此。”一句話之後又夾註引入今日僧五古〈候汐詩〉，中有“失所耐風波，抱病思棲託。孤嶼大洋東，零丁感今昨。撫跡愧文山，浩歎將焉作？”——這位經過零丁洋對文天祥無限懷念的今日僧，他抱病去尋找的“棲託”之地當然就是澳門了。《海雲禪藻集》載函是之徒凡百餘人，未知今日法號者是否函可之徒今日之筆誤。

先是，函是開法，嶺南諸遺老多從雉度。聞函可住瀋陽，因遣其徒今無通問，而函可所度弟子今盲、今匪、今日、今廬、今又、今南等，皆江南人，由是兩家弟子分處南北。⁽³⁴⁾

無論如何，“今”字輩法號者就是函是、函可的直傳弟子，如今釋（金堡）、今種（屈大均）、今無（番禺萬氏子）等，皆為逃禪之抗清志士。函是（1608-1686）本姓曾名起莘，番禺人，早年與里人梁朝鐘、黎遂球、陳學佺輩遊，明亡徙番禺雷峰創建海雲寺，“當時遺臣流寓廣東者多依函是，以雷峰為質的”。像梁朝鐘、黎遂球、陳學佺輩亦皆與函是同禮曹洞宗三十二傳法嗣道獨上人。⁽³⁵⁾函可



本文作者請珠海市政協文史委員會主任梁振興帶路到斗門黃楊山張世傑陵墓考察（2002年元旦）

◀ 張世傑墓碑為端州石板以勾勒陰刻楷書空心字：“宋太傅樞密副使越國張公諱世傑之墓”，上下左右用紅砂岩石條護碑，其中碑首紅砂岩刻的雙龍戲珠如意浮雕已風化。——梁振興提供

(1611-1659)，號剩人，博羅人，本名宗駮，明禮部尚書韓日績長子，少亦與黎遂球輩遊，有匡濟天下之志，國變親睹士夫死難紀為私史，下獄發配沈陽，其弟駮、駮、驥及叔、姊家人皆抗節死。國破家亡有賦云：“忠臣遺廟清珠海，古佛雙林冷莞城。地下定知談往昔，雪中難覓恨孤惇。”自號搗黍和尚，與流寓者結冰天詩社。⁽³⁶⁾

前述引今日僧詩後入正文“由是踰獅子洋”一句又夾註引釋今種詩二首。今種〈出獅子洋作〉看來是屈大均由虎門出洋夜渡澳門之親歷景狀的描摹（“忽爾乾坤大，浮沉黑浪中。火螭銜夜日，金蜃噴天風。”）和寄託切身感受（“洗甲心徒切，乘桴道欲窮。朝宗餘一島，尚見百川東。”）隨後接正文“入黃埔，是為今諸蕃舶口”等句之後，介紹“虎門下有合蘭海，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現城闕樓臺車騎人物，倏忽萬狀。康熙丙辰見戈甲之形，粵有兵變，蓋海市也。”云云，又塞進了一大段夾註，全文引入梁佩蘭作長篇歌行〈海市歌〉，有“市人市中設龍座，聚寶換寶市在左。蕃奴來市騎水犀，上寶負在大尾犛”和“海市寶多，世人奈何”等似為影射澳門“海市”的詩句。上文“粵有兵變”並列出具體時間“康熙丙辰”。當年即十五年（1676）的四月，尚之信接受吳三桂授予“招討大將軍”封號，蓄髮易幟起兵變亂。十月，耿精忠兵敗，驛附朝廷。翌年，尚之信也剃髮降附。到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亂全被平息，耿、尚先後被清廷處死。梁佩蘭詩有“世人眼睛不識寶，海中有寶偏不顧”語，似隱寓逃亡者“海外尋寶圖東山再起”之想，將“粵有兵變”說成“蓋海市也”，似故弄玄虛，然實別有所寄。

黃宗羲嘗謂當以詩證史，不當以史證詩，主張“以詩補史之闕”⁽³⁷⁾。詩史相證的關係，不在乎詩（文學）與史（史書記載）的相吻合，而貴乎詩能記史外之事，“尤其是清初史事，曾經周密的塗改，當順康之際，文網已嚴，雍乾之後，禁忌更多，祇有在詩人的詠嘆中，還能時一流露。”⁽³⁸⁾

《澳門記略》隱蔽地以詩寓史，其微言大義卻發之於詩外，往往令不諳史諱背景的讀者游目而過，就像多少觀光獵奇的澳門遊客那樣，不屑於去沉思澳

門存在的歷史涵義。《澳門記略》能輕易逃過禁燬的厄運而流傳至今，可說是澳門史上的一個奇跡。它原本作為乾隆朝中期安徽坊間出版的一種私人著述，而為四庫館作為“安徽巡撫採進本”收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史部·地理類存目〉⁽³⁹⁾之中。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學政朱筠借乾隆下詔求書之機，提出訪求校錄圖書的建議，《四庫全書》底本（“各省採進本”和“私人進獻本”）的採集自乾隆三十七至四十三年（1772-1778）結束，而所幸的是《澳門記略》祇被列為“存目”之書。《四庫全書》採錄圖書的標準分應刊、應抄、存目三類。被列為“存目”的書雖被視為有裨實用關繫世道人心但內容涉俚淺訛謬，祇允存其書名於《總目》而不錄入《全書》（此類“存目”之書計6793種）。《澳門記略》蓋亦因此不被收入專供御覽的《四庫全書薈要》⁽⁴⁰⁾而得以“冷藏”下來，避過禁燬的文網。看來四庫館審閱《澳門記略》並撰〈提要〉的飽學之士並沒有去深究該書夾註的用心，或有意擱置之，故祇下了“此書於山海之險要、防禦之得失，言之最悉”的大體評語，並補上一句“蓋史舉大綱、志詳細目，載筆者各有體裁耳”，看去倒像是聊以塞責的解釋。《清史稿》（卷一〇七）評論學問淵通的紀昀撰《四庫全書提要》，“進退百家，鉤深摘隱，各得其要旨，始終條理，蔚為鉅觀。”而史部的草稿多出於邵晉涵之手，說他“善讀書，四部七錄，靡不研究，尤長於史”（《清史稿》卷二六八）。紀、邵兩人恐怕不會沒有翻過《澳門記略》就輕易地將它列為存目之書。嘉靖庚申重刊本《澳門記略》卷首孫馮翼〈重雕《澳門記略》題辭依用二宋全濬〉之賦詩透露了當時有關《澳門記略》的重要消息，茲節錄若干詩句略加分析之：“兩公有才凌沈宋，家守遺編盡珍重。”首聯即言“家守遺編”，“遺編”蓋指兩公生前尚未公開出版是書歟？⁽⁴¹⁾姚鼐所寫張汝霖墓銘曰“著有勳，未上聞，乘歸輪，聚典墳，閱厥文，子繼振”云云，亦可印證。姚鼐與張汝霖的長子燾為乾隆癸未（1763）同科進士，“又與炯〔燾弟〕相知”，而嘉慶庚申重刊本正是由布政使孫曰秉和張燾、張

◀ 張世傑墓建在黃楊山東坡，朝向東北，高約90米，左右有山溪匯入白蕉河。墓前橫臥的山脊，佔地面積約500平方米，建築面積177.2平方米（南北17.2米，東西10.3米），坡度約30度。三面環山，一面向古海地，頗有氣勢。華表高2.7米，葫蘆頂，八稜柱，直徑0.3米，北柱曾刻有“雲山空望侍郎宅”，南柱曾刻有“海水猶朝永福陵”，現已風化難辨。——梁振興提供



斗門黃楊山潮居里赤坎村（官涌）現景



斗門南門趙氏祖祠大門



《趙氏族譜》中的張世傑、陸秀夫像



斗門南門逸峰趙公祠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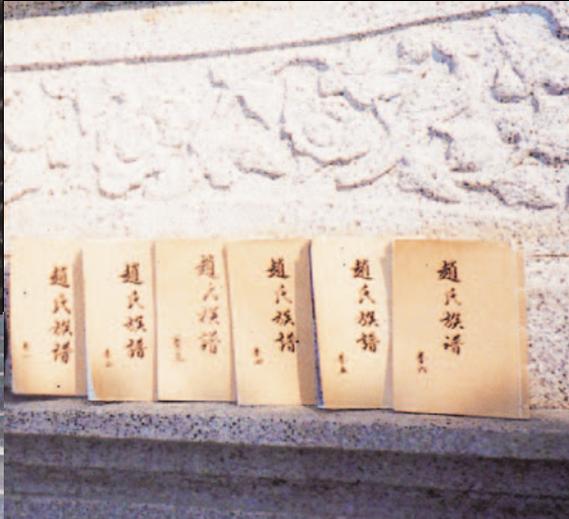
《趙氏族譜》中的文天祥和帝昺像



聯接逸峰趙公祠的昆山趙公祠



趙氏祖祠蠟殼砌牆外觀



趙氏祖祠珍藏的《趙氏族譜》



南門趙氏祖祠二進菴猗堂



菴猗堂藏陸秀夫《忠孝義士》題匾殘件

炯以及印光任的孫子鴻經、鴻緯校刊出版的。“搜羅列入四庫書，海內詞人反覆誦。”是書列入四庫存目，後來才在士人之間傳閱開了。“願書萬本示後來，重付雕鐫分鶴俸。但恨生已廿年遲，不及昇堂笑語共。”嘉慶庚申重刊本1800年出版，據“但恨生已廿年遲”句上推二十年前為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否那就是乾隆原刊本的出版年限呢？張汝霖卒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葬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所謂“不及昇堂笑語共”當非指張公尚健在之時。《四庫總目》幾經易稿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歲尾交由武英殿刊版印行，各纂修官在校閱圖書的同時撰寫各書提要，由總纂官紀昀作最後取舍或修改潤辭。孫馮翼題辭有“蓬山價重鶴書求”、“柘捲手澤什襲藏”、“鄭箋郭注力未解”諸句，反映了《澳門記略》一書的內在價值，這也就是俞正燮於嘉慶七年（1802）春“始讀《澳門記略》，愛其奇偉”的緣故。俞正燮是在嘉慶九年（1804）才得到張炯贈送的重刊本，兩年後（丙寅冬）撰〈《澳門記略》跋〉，在末段措辭絕妙地評說《澳門記略》的傳世價值：“今天子明聖，撫外夷有道，不過以澳門為天文生客館耳。且事久難驟更，以西洋之互為窺伺，知此書必不可廢。”

當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在日益鞏固的專制政權的高壓之下日益消解之後，遺民士子漸取科舉仕進之道，民族意識亦逐漸轉向消極反抗的形式，像波瀾不驚的暗流，承托起精神奴役的寓言之舟，匯入中國晚朝封建社會史的長河。我們不妨也把《澳門記略》看成是一種18世紀清代歷史的“寓言之舟”，它在夾註裡煞有介事地考證澳門的地理名實，好像在漫不經心地引用詩人的吟詠，平添行文的風雅華彩。然而，那些看似隨手拾來的詩文佐料卻隱約地在澳門歷史的夾縫裡閃爍光芒，引人遐思，發人深省。印光任和張汝霖皆出生於人文薈萃的江南⁽⁴²⁾，兩人對明末清初江南和嶺南兩地志士仁人的抗清義舉耳熟能詳，對嶺南派詩人群體亦似心儀已久，尤其是兩人親履粵東任地方官多年，親身結交廣州、南海、番禺、順德、香山等本地文人不乏少數，不乏推心置腹可以相託的莫逆之交。張汝

霖修張世傑墓，在《澳門記略》裡大書特書，相當突出地轉載羅天尺、郭植、李卓揆、何邵等人回腸盪氣悲壯激昂的詩作，這一齣有聲有色祭奠宋末民族英雄張世傑國殤魂魄的公祭公演，寓意深遠，成一代奇偉之絕唱：任、張二位召喚文天祥、馬南寶、張世傑等保宋抗元的亡靈從《澳門記略》的夾註縫隙裡走出來，也是在懷念沉寂於民族意識裡那些可歌可泣的抗清復明的壯烈犧牲者，其詩人的異端性格和歷史的寓言性質昭然若揭，豈可抵賴？

《澳門記略》奇詭怪譎最惹人注目者是在夾註裡用“釋今種”的名銜大量引用屈大均的詩文，凡屈氏著述（主要有《廣東新語》和《翁山詩外》）有關澳門的詩作悉數照收，描述澳門的文字亦八九成轉錄。如此露骨地敢於採錄撰寫頌揚抗清死節義士的《皇明四朝成仁錄》作者的大量詩文，恐怕不能單用一個法號就可以掩飾過去的。一說屈大均的文字獄正式起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兩廣總督李侍堯的建議後⁽⁴³⁾，《澳門記略》完稿於乾隆十六年（1751），而屈大均入番禺雷峰海雲寺為僧則在順治七年（1650），至康熙元年（1662）還儒，以釋今種詩入《澳門記略》實與逃避文字獄無關。⁽⁴⁴⁾順治七年還是清兵第二次進攻廣州之時，其時曾協助南明政權的澳門葡人尚採取觀望態度，澳門頓時成為明亡之後遺民的逋逃淵藪，尤其是粵、閩、浙等地士人，在“清人既得南京後，廣東諸省服屬於清，故逃出海外香山島，興販資生”⁽⁴⁵⁾，因此，澳門就成為被稱為“海外”的“明之遺民，多入居之”的抗清秘密聯絡點。如何絳在順治十五年（1658）“與同里陳恭尹澳門之遊，復同渡銅鼓洋，訪逃避諸遺臣海外”⁽⁴⁶⁾，而屈大均其時當亦為“海外”訪客之一。永曆元年（順治四年，1647）業師陳邦彥起義師抗清，18歲的屈翁山同懷忠憤，有捐軀報國之志，遂從師獨當一隊，“或執鞭弭於沙場，或奉血衣於空谷”（〈書西臺石文〉）。師殉難，翁山深懷豫讓“漆身”之痛，誓報“師仇”“國愆”（〈死事先業師贈兵部尚書陳巖野先生〉），翌年作〈戊子（1648）秋夜恭懷先業師巖野先生〉詩，末有“慚予亡命走天涯，誤擲千金博

浪沙。窮途不得尺寸柄，髡鉗為奴賣朱家。”語殆指到澳門圖謀再造，時為1647年至1648年之間的冬春時節。《廣東新語》卷二〈地語〉“澳門”條記“有參將府握其吭與澳對峙”云云，屈氏當時在前山寨所見之“參將府”係自明天啟元年始立，而在康熙三年改為“副將府”⁽⁴⁷⁾的，可見屈氏至遲當在康熙三年之前就到過澳門，或可推定屈氏在他“逃禪”期間之順治七年（1650）之後至順治十四年（1657）秋度嶺北遊之前期間又到過澳門，因為那個時段所寫下的“澳門詩”皆冠以“釋今種”之作，此一時期正是朱彝尊（竹垞）在〈《九歌草堂詩》序〉中所指的：“予友屈翁山為三閩大夫之裔，其所為詩多愴況之言，嶮然自拔於塵壙之表。蓋自二十年來，煩冤沈菀，至逃於佛老之門復自悔而歸於儒。……予與翁山相遇南海，嗣是往來吳越十年之間，幾所與詩歌酒宴者，今已零落殆盡。至竄於國殤山鬼之林，散棄原野。……世徒嘆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志之可憫也。予故序之，以告後之君子誦翁山之詩者，當推其志焉。”所謂“推其志焉”，是指屈大均“往來吳越七年間”所受顧炎武、李因篤、朱彝尊等堅持民族大義、抗清報國的精神影響。屈大均18歲時糾合數千壯士參加業師陳邦彥發動的抗清戰鬥，兩年後赴肇慶行在上〈中興六大典書〉，被視為“永曆遺臣”，至1650年清兵再陷廣州，時大均二十一歲即“逃禪”事函呈居“死庵”隱蔽行藏。至1657年秋大均度嶺北遊，1660年抵會稽，“與魏暉、祁班孫同預通海（鄭成功）之謀”，事敗歸粵即棄僧返儒，時為康熙元年（1662），至1665年復北上串聯義士規劃抗清祕密活動。由此可推定屈大均到澳門的時間應在1650至1657年之間，而在他棄僧返儒的1662年以降的一、兩年間（即在康熙三年之前）亦有可能到過澳門從事尋訪遺民活動，翁山傳記資料中之“三藩事起復左右其間”當涉及在澳門的活動。屈大均至1682年復歸番禺隱居，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兩廣總督吳興祚招屈大均與王士禛等飲於端州石室巖欲疏薦屈氏，屈以著書未竟謝絕之。據汪宗衍《屈大均年譜》康熙二十五年（1686）收入〈西洋郭丈贈我珊瑚筆架賦此答之〉和〈壽西洋郭丈〉詩，二十七年（1688）屈大均遊香山過鄭文學草堂，當年

又寫下〈西洋菊〉、〈玻璃鏡〉等在澳門所見物事的詩，還有一闕調寄“玉女瑤仙配”詠白鸚鵡詞，有“西洋巨舶，濠鏡蠻奴，有番言漢語諸音都習”句。往後兩年內又寫下了〈茶蘼花〉（二首）、〈澳門〉（六首）、〈望洋臺〉等等澳門題材的詩作，反映了屈大均晚年亦與澳門結緣。大均晚年窮而彌堅，整理編著“屈沱五書”，65歲（康熙三十三年，1694）時窮到要將先前澳門葡人郭丈所贈的珊瑚筆架及數件古玩典當得銀兩許用作餬口。⁽³⁹⁾屈大均以屈原苗裔和明遺民自居，雍乾年間，其書被一再禁燬。

至於說《澳門記略》夾註引用大量翁山詩全部署名“釋今種”並非是為了逃避文字獄，而是該書“成書”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式”禁燬屈著之前，因此竟使《澳門記略》逃過大難，尚宜推敲之。看來《澳門記略》寫作與出版的歷史背景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了。鄧之誠先生《清詩紀事初編》中屈傳引證頗詳，茲錄於次：

〔屈大均〕所撰翁山易外、詩外、文外、翁山文鈔、詩略、廣東新語、廣東文選、四朝成仁錄，皆以乾隆嚴禁之故，流傳極稀。世傳其遭禁由雨花臺衣冠塚誌，其實他文有關雜髮者，若藏髮冢銘、長髮乞人贊、禿頰、藏髮賦，皆為當時所萬萬不容者，憤激指斥之語，幾於篇篇有之，未與身後之獄，已為厚幸。據清代文字獄檔，翁山書遭禁始於雍正八年（1730）。所頒大義錄中張熙供辭，涉及屈翁山集。其子惠來縣教諭屈明洪，自行投首，照出首減等，與子自睽宗昌遣戍福建，乾隆二年（1737）赦歸。翁山柩葬番禺思賢村父宜遇墓下，原擬剖屍梟示，得旨寬免。至乾隆三十九年，於屈昭泗家查出翁山文外，內有雨花臺衣冠塚銘，嚴查未獲。稔湏昭泗初擬斬決，得旨但燬其書，不必治罪，並免翁山剖屍，此其案大略也。乾隆一朝禁書，以翁山為最嚴，其惡護〔雜〕髮，殆有勝於誹謗矣。⁽⁴⁸⁾

雍乾兩朝大興文字獄，屈大均著述均遭禁燬。繼清初禁燬“違礙”圖書，至乾隆為烈，查禁屈大

均遺著大為嚴厲，直同梳篦，搜剔無餘。清代學者盧見於乾隆十七年（1752）刊《漁洋感舊集小傳》，卷四目錄也隱諱屈大均姓名而作“釋今種”，書中正文全刪，僅留下“釋今種字騷餘”六個字。⁽⁴⁹⁾其時正是《澳門記略》撰寫的年代，盧見為存史而不得不採取避禍的手法。羅天尺撰《五山志林》多引《廣東新語》，亦故諱其書名，而稱曰《焚餘集》。⁽⁵⁰⁾到了乾隆三十九年（屈大均卒後七十八年），簡上用三元錢從屈氏族人家中誑得屈著三本，從而又製造一起屈大均詩文大案，影響全國。乾隆借比發佈〈呈獻違礙書籍諭〉，直斥“以筆墨詆譏之事，大率江浙兩省居多，其江西閩粵湖廣亦或不免”⁽⁵¹⁾。《澳門記略》隨註勾沉的詩篇作者不少是有“違礙”之嫌疑者，多半與屈大均有君子之交。例如：陳恭尹（1631-1700）少與屈大均、程可則同師其父陳邦彥於廣州粵秀書院，曾參與鄭成功、張煌言抗清大計，康熙十七年（1678）遭嫌疑下獄，所著《獨漉堂集》入禁書目。梁佩蘭（1630-1705）則自稱為陳邦彥的私淑弟子，與陳恭尹、屈大均、張穆、陳子升、王邦畿、何絳、陶璜等粵中抗清詩人和遺民詩人有深交，“是時嶺海文社數百人，推梁佩蘭執牛耳。”⁽⁵²⁾釋榭刪係方殿元從弟，本名顛愷，其父方國驊知名海內，與陳邦彥為同年友，赴桂林行在時與恭尹同官，年四十一尚之信降時削髮為僧，所著《咸鷺堂集》入禁書目。⁽⁵³⁾羅寧默是遺民詩人，少與黎遂球相師友，國變之後有“高懷不讓先民頌，何可無詩寄草堂”情懷，其詩“體體起雷造冰，字字剝心瀝血”⁽⁵⁴⁾。毛奇齡，蕭山人，甲申後祝髮，竄身山谷，舉康熙己未鴻博，授檢討，纂修明史，以病乞歸，他的《毛西河合集》中有〈法駕導引·送一靈〔屈大均法號〕和尚還羅浮〉詞，曾為翁山《道援堂詩集》撰序云：“予之見翁山，則自翁山遊東海始。”可知是1660年翁山抵會稽與魏畊客祁氏山園共商匡復大計之時，絕非泛泛之交也。魏畊先曾通過朱彝尊遊廣東與翁山商討鄭成功、張煌言北伐方略，朱彝尊（竹垞）是在明亡後結識魏畊、祁班孫等“先後凡六人，往來吳越，以詩古文相砥礪”⁽⁵⁵⁾進行復明申聯

活動，順治十三年（1656）遊粵廣泛結交廣東復明運動中堅人士陳子升、張家珍、屈大均等，當時可能到過澳門尋訪“海外義士”，因而有“想象戈船猶漢日，忽驚風土異鄉邦”之詩句。魏畊早在順治九年（1652）左右通過錢謙益推薦進見吳偉業，“以其私所憂者”相告，錢強調魏畊等人“今世士流罕有其儔，而樸厚謹直，好義遠大，可與深言”云云⁽⁵⁶⁾，可知吳偉業亦曾染指勝朝遺事。吳偉業（1609-1672），師張溥，為晚明復社“十哲”之一，繼東林餘響，一時聲動朝右，入清後所作詩文不勝黍離麥秀之感，閱歷興亡，激楚蒼涼，“身經亡國之痛，無所洩其幽憤”⁽⁵⁷⁾。清順治十年被徵召出山任國子監祭酒，三年後借母病還鄉，痛感失節，自言“萬古慚愧”，擅長以歌行抒寫明朝興亡、南明覆滅史蹟，表露反清情緒。王士禛（1634-1711），號漁洋山人，康熙朝官至刑部尚書，以王五一案革職，曾宦遊秦蜀楚粵吳越，不以勢位高低論交，倚重錢謙益，稱吳偉業為師，倡為神韻之說，與朱竹垞、陳維崧、洪昇等頻相酬唱，文友幾遍天下。汪後來（1678-1752？），安徽歙縣人，佔籍番禺，康熙四十一年（1702）武舉人，官至守備，為佛山千總，善詩畫，性高介，曾創汾江詩社於佛山，釋跡刪、梁佩蘭、羅天尺等皆其吟友，與澳門同知張汝霖相知最深，曾邀郡中名輩二十五人釀金資助，所為底事，甚關重要，循此或有意外消息。

《澳門記略》全書夾註援引不少當代和前代史家、史官的詩作，例如崇尚實學、堅持民族氣節的顧炎武，曾於康熙五年（1666）與盤遊關中的屈大均結識，其治史編志的思想方法對印、張當有所影響（顧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日知錄》等數十種）。《記略》引尤侗《外國竹枝詞》達二十二首，尤侗稱東南老宿，明季有聲社盟，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入明史館撰明史志傳三百餘篇、明史外國志八卷，其雜俎一集八卷乾隆時列為禁書。⁽⁵⁸⁾王士禛詩亦被援引達十四首，他是神韻說詩派領袖，追求雅正而有風韻、沖澹而能蘊藉的審美風尚，印光任的澳門風景詩就極具神韻說之清幽澹遠、典雅含蓄的風格。

澳門記畧上卷



寶山 印光任 纂

宣城 張汝霖

形勢篇

潮汐風候附

濠鏡澳之名著於明史其曰澳門則以澳南有四山
離立海水縱橫貫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門故合稱澳
門或曰澳有南臺北臺兩山相對如門云澳今西洋
意大里亞夷人僦居環以海惟一逕達前山故前山
為拊背扼吭地北距香山縣一百二十里而遙南至

此外還有諸如王鴻緒（官至戶部尚書，著有《明史稿》）、毛奇齡（明史館纂修官）、李紱（乾隆時充《明史綱目》館副總裁）、李日華（明萬曆朝太僕少卿，著有《官制備考》）、高詠（宣城人，康熙朝博學鴻詞科，曾與修《明史》）、吳偉業（史著有《綏寇紀略》、《紀略薈萃》等）、高啟（明洪武朝編修，與修《元史》）、黃佐（明正德朝翰林院編修、少詹事，撰《廣東通志》、《香山縣志》等），可謂皆集史家與詩家於一身的儒雅文士。

印光任、張汝霖本身是江南儒士，博識遠見，具備稽古述新的文史素養和寫作能力。印光任另有《炳巖詩文集》、《翊蘄編》、《補亭集》、《話雨吟》、《碎琴草》、《鐵城唱和集》等，且擅長丹青，車騰芳曾題其〈天臺圖〉、〈行樂圖〉，林蒲封題其〈江鄉清夏圖〉。張汝霖有詩文集三十卷、政牘五十卷、其它百餘卷，詩集有《辛辛草》、《吳越吟》、《耳鳴集》等，其詩風格不凡，可比追隨園領袖。⁽⁵⁹⁾乾隆時舉博學鴻詞科授編修受命校勘十三經二十四史的清代碩儒杭世駿（1696-1773），對張汝霖及《澳門記略》曾連聲褒贊，評價甚高，有詩為證：

皇威遠播海氛空，三跼虛無衍不窮。
一卷把君風土記，澳門龍女擲珠還。⁽⁶⁰⁾

鄧之誠先生論清詩云：

康熙中葉以後，復用兵西北。蓋兵革之事，未嘗一日或息。黨爭則滿漢有爭，南北有爭。廢太子之爭，幾互三十年。當玄黃未判之際，為商遺般頑者，不能無恢復之望，因以事以文字獲罪死徙者多矣。兵餉不繼，胥吏苛求，更若水旱地震之災，奢侈貪贖之習，商賈之操縱盈絀，巨室之為患鄉里。是時兵刑河漕，號為大政，而不能無得失利病。又值通海，梯航遠至，西學西器，漸入中土，書史但稱是時之盛，民生疾苦，不能盡知。唯詩人詠歎，時一流露，讀其詩而時事大略可睹。⁽⁶¹⁾

《澳門記略》也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之前展開了最具那個時代特色的典型歷史場景，它亦為我們提供了“讀其詩而時事大略可睹”的那種稱之為“以詩證史”之歷史學闡釋方法的一個範例。陳寅恪先生“鉤索乾隆朝史事之沉隱”⁽⁶²⁾的史學辨證方法對研究《澳門記略》毋疑具有春秋大義的指導意義。那也就是陳先生在《柳如是別傳》大著中所揭櫫的：

雖然，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闕燼禁之科，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⁶³⁾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也注意到了“廣義文化史研究”的召喚，很想擺脫繁瑣考證和以論帶史的兩難困境，而“轉向以研究社會風習和時代情感、社會轉變中的價值變遷為重點的全新的方法”⁽⁶⁴⁾。然而，面對《澳門記略》所蘊涵的那一種“奇偉”而深沉的歷史感與日俱增，自己也就愈發覺得心餘力絀，未能櫛沉其什一，謹此懇請師長和學兄們不吝指教！

【註】

- (1) 《澳門記略》張汝霖序，見趙春晨校註本，頁11。《澳門文化叢書》之四，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2。
- (2) 見趙春晨：〈關於《澳門記略》乾隆原刊本的幾個問題〉，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十九期，頁134-135，1994。
- (3) 《澳門記略》印光任後序。
- (4) 《澳門記略》張汝霖前序。
- (5)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商務印書館，1939，頁1587。
- (6) “《澳門記略》作為澳門的方志，殊重於當地的管理制度和居民特點。”（見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十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頁91。葡人 Friar Joseph de Jesus Maria 於1744-1745年已撰成 Asia Sinica e Japonica（《亞洲之中國與日本》），卻遲至19世紀末和20世紀40年代才見部份刊載於澳門出版的葡文刊物《大西洋國》（Ta-Ssi-Yang-Kuo）和《澳門教區簡報》（Boletim Edesia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見C. R. Boxer, Fidalgo in the Far East, pp.284-285。
- (7) 明嘉靖八年（1529）兩廣巡撫林富上〈請開海禁疏〉提出“互市有四利”說獲明世宗“詔從之”：“請令廣東察番餉例，許通市者毋得禁絕。嘉靖三十二年（1553）澳門開港允許“諸番之復通市，自林富始。”——由此，葡人遂得混入澳門經營海貿生意。（見《澳門記略校註》頁62。）
- (8) 乾隆九年（1745）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指科舉“徒尚空言，不適用”，請予以廢止，別求遴選真材之道。清高宗對此經國大計則視若罔聞，反而大興文字獄，變本加厲地施行專制高壓政策。

- (9) 採自嘉慶庚申重刊本《澳門記略》卷首之袁枚〈廣西太平府知府印公傳〉、暴煜《香山縣志》卷四之〈印光任傳〉。
- (10) 暴煜《香山縣志》卷四之〈張汝霖傳〉。
- (11)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p.284和pp.242-243有耶穌會士“給了香山縣官員一大筆錢”之說；龍思泰《早期澳門史》(Andrew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1836, pp.105-106.)有“議事會送給中國官員和死者家屬一筆錢”之說；章文欽教授認為上述說法可信，“是張汝霖平生一大污點”。(章氏：《澳門歷史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9。〈《澳門記略》研究〉，頁273。)
- (12) 姚肅〈廣州府澳門海防同知贈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讀張君墓誌銘並序〉，嘉慶庚申重刊本《澳門記略》卷首，轉引自趙春晨校註本頁270。
- (13) 暴煜《香山縣志》卷四。
- (14) 《癸巳存稿》卷五《澳門記略·跋》。
- (15) 見《澳門記略·張序》。
- (16) 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175。又見(清)溫汝能纂輯、呂永光等整理、李曲齋、陳永正審定：《粵東詩海》，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中冊，頁1126-1127。
- (17)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五三、列傳第一四一附〈王應熊傳〉。
- (18) (清)夏燮撰《明通鑒》，王日根等校正本，岳麓書社出版，1999，下冊，頁2640。
- (19) 顧誠著《南明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394-402。
- (20) 《明遺民錄彙輯》，同註(16)。從《粵東詩海》卷六十所錄何準道詩亦可感受到其多方外交聯絡志士的氣氛，如〈余十年僅一過邑……〉說他歷十載才回香山一遭，“振衣一長嘯，風捲海濤聲”(〈玄英閣〉)，“伏波銅柱草離離，拾扼南交事已違。廉吏不勞珠自返，逐臣無計雁同歸。……”(〈雜詠〉)等詩句所描摹之情景似與澳門有關。
- (21) 《粵東詩海》卷七十九。
- (22) 羅天尺《五山志林》卷三〈談藝〉。
- (23) 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自序〉，1916年聚德堂叢書本。
- (24) 《中華文明史》第九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頁531。
- (25) 李祖陶：《邁堂文略》卷一〈與楊蓉諸明府書〉。
- (26) 《掌固拾零》卷二，頁八。
- (27) 《國朝詩選》彭廷梅〈凡例〉，乾隆十四年據經樓刻本。
- (28) 轉引自謝正光、余汝豐編《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341-343。
- (29) 同上註頁347，鄧之誠跋。
- (30) 同上揭書頁351。
- (31) 《東華錄》乾隆三十九年八月。
- (32) 章太炎《瘡書》〈哀焚書〉頁五十八。
- (33) 薛繼，陝西維南人，進士，乾隆初年任廣東南韶連分巡道，曾於乾隆十年(1745)二月偕澳門海防同知印光任、香山知縣江日暉到澳門巡查視察，寫下了一篇〈粵門記〉(見《澳門記略》頁26-27。)
〈虎門記〉也是薛繼當時巡海時所作，結語提出“海門以間內外也，外因於內，變生於常，道必又有制治於兵防之先者”的關防策略。
- (34) 《勝朝粵東遺民錄》卷四“函可”條。
- (35) 《明遺民錄彙輯》〈函暉〉，頁一二九二 - 一二九七。
- (36) 《粵東詩海》，頁一八四八，《明遺民錄彙輯》〈函可〉，頁一二八五 - 一二九二。
- (37) 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萬履安先生詩序〉。
- (38) 鄧之誠撰《清詩紀事初編》，鮑正鵠〈前言〉，頁3。
- (39)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四〈史部·地理類存目〉三。
- (40)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于敏中、王際華奉敕在《四庫全書》中撰其四百六十四種精華錄為《薈要》，按《全書》式樣繕寫兩部(四十二年完成)，分別藏於長春園映味室和御花園摘藻堂供御覽之用。
- (41) “乾隆原刊本”之外還有一種“烏絲欄抄本”(廣東中山圖書館藏)，被已故藏書家徐信符鑒定為“精抄本”。有說精抄本以原刊本為底本，然而似有可能精抄本就是“家守”之“遺編”，因為四庫採進本也包括手抄本(稿本)。這樣設想，原刊本也有可能是在“錄入四庫書”之後才刊行的。
- (42) 據任、張同時代人暴煜《香山縣志》任、張傳云：“印光任、江南寶山人”和“張汝霖，江南宣城人”，故依是說。拙文《澳門歷史語言文化探述》(1999)指《澳門記略》作者是長江以北人氏，將安徽宣城及寶山誤為長江北岸，經中國交通部水運研究所施存龍先生賜函(2000年3月)教正，借此致謝。
- (43) 《清乾隆實錄》卷九七〇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戊午及己未條。
- (44) 湯開建《明清士大夫與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1998。〈屈大均與澳門〉，頁147。
- (45)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中華書局，1980，第9冊下編卷二顯宗十一年(康熙九年)記濟州牧使盧錠秘密馳啟事。
- (46) 《勝朝粵東遺民錄》卷二〈何絳〉。謝正光編上揭書，頁164。見同書頁763〈陳恭尹〉則說陳氏“聞諸遺臣多逃避海外，戊戌春(即順治十五年)復與何絳出咄門渡銅鼓洋訪焉。”——是以“海外”為“澳門”代稱的又一例。
- (47) 《澳門記略》上卷〈形勢篇〉。
- (48) 《清詩紀事初編》卷二，前編下，頁二九一一—二九二。
- (49) 見歐初、王貴沈主編《屈大均全集》前言(頁10-1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50) 《屈大均全集》附錄一汪宗衍《屈大均年譜》，同上揭書卷四頁一九三二。
- (51) 《乾隆朝實錄》卷九七〇。
- (52) 《清史列傳》〈韓海傳〉。
- (53) 《勝朝粵東遺民錄》卷一。
- (54) 《勝朝粵東遺民錄》卷二。
- (55)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七十二墓表一，〈貞毅先生墓表〉。
- (56) 《錢牧齋尺牘》卷上，〈與吳梅村(三首)〉、〈又(論社)〉。參見馮其庸等《吳梅村年譜》，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頁234。
- (57) 鄭振鐸：〈梅村樂府二種跋〉。
- (58) 鄧之誠撰《清詩紀事初編》卷三〈尤侗〉，頁三一七。
- (59)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一有〈哭張芸墅司馬〉詩云：“我詩重生趣，君詩重風格。相期千載後，彼此留一席。”
- (60) 《嶺南集》卷四，杭世駿〈寄張汝霖司馬宣城十首〉之七。
- (61) 《清詩紀事初編》序，上冊，頁三。
- (62) 見《寒柳堂集·論再生緣》，頁56-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63)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冊，頁四。
- (64) 這是廣州中山大學姜伯勤教授對陳寅恪先生授課時指說自己是用“開拖拉機的方法來研究歷史”一語的闡釋。見張傑、楊燕麗選編《解析陳寅恪》一書所收的姜伯勤論文〈陳寅恪先生與心史研究——讀〈柳如是別傳〉〉，頁233-2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